

龍灣書話

温州市龙湾区文联 编

西泠印社出版社

鄧三書洛

鄧賢人倫敬題



温州市龙湾区文联 编

西泠印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龙湾书法 / 温州市龙湾区文联编. -- 杭州: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7-5508-1895-8

I. ①龙… II. ①温… III. ①汉字—书法—发展—概况—温州 IV. ①J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51839号

龙湾书法

编者: 温州市龙湾区文联

出品人: 江 吟

责任编辑: 吴心怡

责任出版: 李 兵

责任校对: 刘玉立

出版发行: 西泠印社出版社

地 址: 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32号5楼 (邮编: 310014)

印 装: 浙江省良渚印刷厂

开 本: 880×1092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30千字

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8-1895-8

定 价: 120.00元

序

赵雁君

龙湾有一片丰厚的传承有序的书法历史文化土壤。明代天顺年间，梅头（今海城街道）东溪村走出了“一代书宗”姜立纲，此后明代王瓚、张璫、王叔杲、王叔果、王澈、王铮、张逊业等构成了明代龙湾善书者群体。清代张元观、张振夔，现代夏承焘、张光、王梅庵等书法家为地方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成为涵养当代龙湾书法人文精神的渊藪。

龙湾有一个活跃的书法文化活动机制，创立书法专业社团是当代龙湾书法发展主要的驱动。龙湾区乡间书法活动频繁，开展民间书法活动、校园书法文化教育，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群众性书法比赛。近年来，政府和社会在书法群众活动、书法教育培训方面形成共识。从1996年至今，举办了40余场影响较大的书法展览。2013年8月，龙湾区海滨街道宁村村获得“浙江书法村”称号，成为浙江首个书法村。龙湾区着力打造校园书法文化教育，先后扶持一批书法特色教育学校和培训班，创建一批书法教育实验基地等。1996年，龙湾成立罗峰艺社、龙湾区书画协会（区书法家协会），2007年成立区政协书画院。此外龙湾还有机关、企事业、农民、妇女、老人等书法爱好者组成的业余社团，涉及近千人，构成当地全民性的书法群体，有效夯实了地方书法文化土壤。

龙湾有一批上进善学的书法种子。伴随着上世纪90年代的“书法热”，出现了所谓的书法“温州现象”，作为“温州书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龙湾书法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出现了如徐强、邱朝剑等诸多佼佼者，在全国书坛产生了较大反响，引起书法界人士的关注。近十年来，龙湾区书协现有注册会员135名，其中中国书协会员23人，省级书协会员29人，34人次担任省、市书协专业委员会班子成员或委员，会员创作成果丰硕。截至2014年，龙湾区有300多件书法作品在中国书协、省书协主办的重大书

展中参展。其中 60 余人次作品获奖，包括全国二届青年展、三届兰亭展、三届兰亭奖、十届全国书法展、首届手卷书法展、八届“沙孟海奖”、七届“陆维钊奖”等，5 人获省青年书法二十佳称号，11 人被省书协，市、区政府部门授奖。区书协连续两次被浙江省书法家协会评为全省县级书协先进组织；庞大的书法群体、优秀的书法创作者、工作者，为龙湾区申报“中国书法之乡”提供了出色的成绩单。

龙湾有一个强大的着力打造“中国书法之乡”的政府力量。针对龙湾现当代书坛人才辈出的良好态势，为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彰显书法艺术魅力，提升城区文化品位、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加快文化强区建设步伐，龙湾区政府因缘际会，抓住机遇，适时提出打造“中国书法之乡”的口号。按照党的文艺“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龙湾区委宣传部、区文联联动区市书协，在“立足龙湾、面向全国”的发展思路之下，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强化督查、有序推进、深化宣传、齐心协作，举全区之力争创“中国书法之乡”。

龙湾，成为“中国书法之乡”，乃历史使然，时代造就。此次结集，再次见证龙湾书法之乡的书法底蕴与书法成果，由此也佐证龙湾政府、社会对“中国书法之乡”品牌的珍视和不断进取提升的追求。

希冀龙湾能成为浙江书法高原的沃土，为浙江再攀书法高峰垒好石、筑好基，发挥“中国书法之乡”应有的作用。

目 录 CONTENTS

序..... 001

山海气象

龙湾书法史论..... 002

龙湾书法历程

——从明代到民国..... 015

艺术遗珠 独放异彩

——清代以来龙湾民间书法拾萃..... 032

龙湾当代书法概述..... 038

罗山墨韵

墨韵罗山，翰香龙湾

——写在龙湾区申创“中国书法之乡”之际 054

书家寄语..... 059

书宗故里，雅舍争辉..... 063

墨畅笔酣鹏翼举

——罗峰艺社记 067

精心培育花蕾美丽绽放

——龙湾区青少年书法教育纪实 072

龙湾区创建“中国书法之乡”纪实 082

罗峰书论

明姜立纲与他的书法艺术..... 094

姜立纲书《明宪宗皇帝御制重修孔子庙碑》考..... 098

姜立纲及其书法的历史评价..... 106

锐意革新 心系桑梓

——从张璪书法走进一代政治家的情感世界 110

章草大家王荣年生平及书法..... 115

书坛遗珠王荣年..... 119

王荣年书法遗作展琐记..... 135

零落成泥碾作尘 只有香如故

——王益强回忆父亲王荣年 141

王荣年书法十人谈·····	148
文化潜流涌现的时代浪花 ——从罗峰书院到罗峰艺社 ·····	158

书行天下

马青原·····	164
王 昕·····	166
王 晖·····	168
王天津·····	170
王兴森·····	172
王学元·····	174
许瑜瑜·····	176
孙福泽·····	178
杨贤森·····	180
吴明哲·····	182
邱朝剑·····	184
沈显文·····	186
张利安·····	188
张煦阳·····	190
陈 佐·····	192
陈之卿·····	194
陈国钦·····	196
陈显丰·····	198
郑光泽·····	200
项飞云·····	202
项建勇·····	204
徐 强·····	206
曹 俊·····	208
谢利疆·····	210

附 录

龙湾区书法家协会大事记（1996年—2015年）·····	212
龙湾籍中国书协会员名单·····	217
龙湾籍浙江省书协会员名单·····	217
会员参加中国书协主办展览情况一览表·····	218
会员参加浙江省书协主办展览情况一览表·····	224
代后记·····	230

山海气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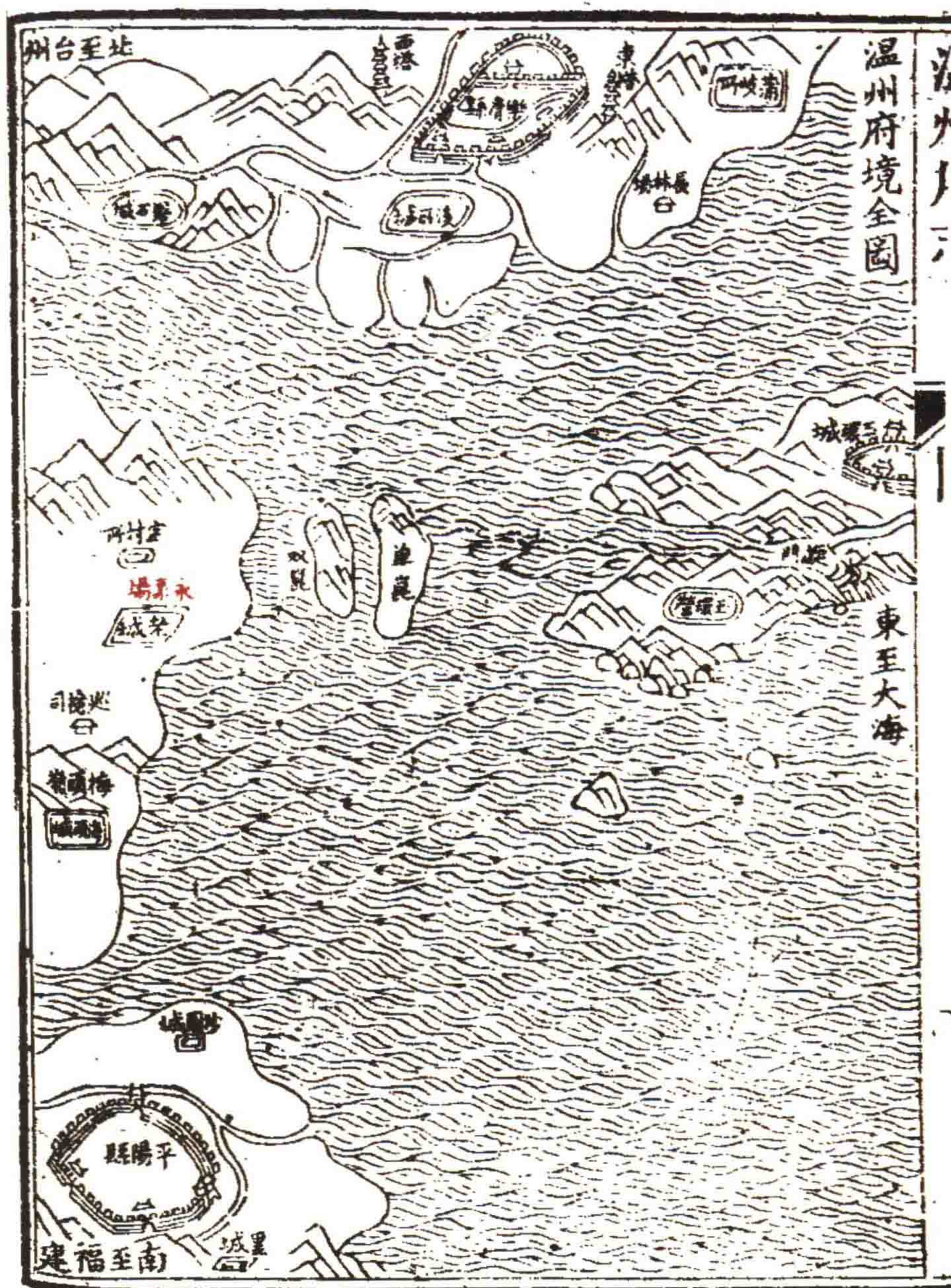
龙湾古属东瓯，历史悠久，依山临海，人文辉煌，玄妙深奥。历代书法名流辈出，山海气象，龙腾凤翔，蔚然成风，展现浓厚的人文风采。特别是明代时期出现历经四朝的中书令姜立纲、嘉靖首辅张璁等，引领书风走向新高潮。随后，风起潮涌，长盛不衰，从龙湾书法历程中，寻找的先辈书家的别样的智慧与人文精神，从而感悟龙湾书法的地域文化特色。

龙湾书法史论

书法中的权力意志

龙湾作为历史地名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明代瓯江口的一个渔村。1984年龙湾建区，辖蒲州、状元、瑶溪、龙湾四镇及龙水一乡。2001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温州市辖区行政区划调整，成立龙湾区，辖5个街道和5个镇，区域陆地面积279平方公里。现所见有一定数量且具讨论价值的龙湾地区书法文献出处可追溯到明代的永嘉场。明代永嘉场属于二都。侯一元《永昌堡记》：“永嘉场者，吾温之奥区也，地方五十余里，西负崇山，南北阻岭，东面大海，鱼盐万井，衣冠萃焉。”清代建制永嘉县，其中永嘉场辖一、二、三、四都，面积192余平方公里。现今的龙湾区即是以历史上永嘉场为主体的行政区。那么，面山濒海的永嘉场即成为龙湾书法作为区域文化的概念提出的核心载体。

虽然永嘉场盐业生产于唐代闻名，但文化的繁荣，则是经过数百年积累后的明代。在军事驻所的庇护之下，有赖于盐业生产和海涂垦殖，永嘉场出现了若干地方望族。稳定且相对优裕的物质支持有利于形成家学传承脉络。望族之间以姻亲、友朋关系则除了物资交流（比如礼物、嫁妆）之外，还彼此挈带，互通消息，结成社会关系网。这在当地族谱及文人个集中颇有体现。该种联系为地方书手群体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比如姜立纲（1444—1499）系瑞安府德政乡东溪（今龙湾区海城街道）人。其祖母周氏为状元周旋之姑，叔父璧、琨任职朝廷，姜立纲的祖父母、伯父、叔父均善书能诗。童年姜立纲因善书而入选翰林院秀才，启蒙教师有同乡、中书舍人任道逊（1422—1503）。任道逊善书能画，温州博物馆藏其山水画条幅二张，章法简单，运笔大刀阔斧，与其题跋的秀雅不很协调，大概是



随兴所至的作品。传说姜立纲亦擅山水，“深得黄子久法”“以黄鹤山樵为宗”，但世论姜立纲以善书著名，称“姜体”。

明代中后期褒贬姜书，两端殊为对立，褒之者如“端正凝重”，贬之者如“俗濁之甚”，实由审美立场异趣所致。如果放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下观察，姜立纲的出场实有历史的必然。明代前期馆阁体盛行，姜立纲参与营造了大环境，推进了大趋势，成就了“一代书宗”。时势造就英雄，英雄引领时势，二者实为辩证统一的历史规律。

现见姜立纲书法多为正书，原件如《东铭》《千字文》清劲严整，在颜柳之间。众所周知，唐代正书楷法精严，气势恢宏宽博。明代馆阁体取于唐楷，只是不再恢宏宽博，而易以严密精整。与姜立纲时代先后的永嘉场擅馆阁体书风者尚有李阶（1456-1533）、王瓚（1462-1524）、张璫（1475-1539）、王澈（1473-1551）诸辈。明中后期永嘉场善馆阁体书法者则有：王诤（1508-1581）、张承明（1514-1592）、王叔果（1516-1588）、王叔杲（1517-1600）、周宗旦（1523-1600）、张逊业（1525-1560）、王光蕴（1540-1606）、王名世（1574-1646）等。大抵皆以瘦硬为尚，多宗颜柳、赵孟頫，或许另有宋克、二沈、解缙等时人的影响，此处不及细考。

明代前中期书家的书写存在极端的两面性。一面是应制，写工细的楷书，另一面则是大幅的狂草书。这种大幅草书立轴的样式，很有可能是为适应宫廷悬挂布置需要而风行起来的，明初的宋璉以及解缙、沈粲等均有这类大幅草书作品传世。一般认为，正书与草书，后者更能体现作者的情性。姜立纲正书的精严自不待言，今见其草书巨幅《李白梦游天姥山吟留别》似亦发现其潜意识中的约束。该件归藏瑞安博物馆，可能原藏于地方人士之手，由此推之姜立纲作书可能处于放松状态。但此件线条纤弱，骨胜于肉，章法平平，似有无形的限制。联想之沈度、宋克、解缙以及姜立纲的同乡后学张璫《别来帖》手札，亦可证长期的馆阁体训练导致书写者的自我约束内化为时代人格的一部分。直到明代中后期，祝允明、董其昌为代表的书写群体的兴起而书风丕变。反观永嘉场士人如王澈、王诤、王叔杲、张逊业行草书，可知明代中后期的文艺解放。如侯一元评点张逊业“怀素行草，咸酷似”；王澈跋檀芝瑞《送别图》似从二王或赵孟頫出，线条丰润，结体或有随手写来的自然趣味，与前辈的瘦硬规整迥然有别。理学家王诤（1508-1581）书《嘉靖辛酉奉使河东夏五过白马寺漫赋一首》碑刻，线条

妖娆劲利，字形右上倾，强化了咄咄逼人的视觉冲击，篇末行距拉开，字形个个放大，势不可遏。书风流变的背后本质是极权政治的渗透力在文化中的消退。一个让人敢于思考、说话的时代，必然带来艺术的开放性、多样性。

董其昌评点姜立纲颇不以为然：“国朝制诰，乃使中书舍人为之写轴，而书法一本沈度、姜立纲，何能传后？”其他如丰坊、冯班、范钦、李贽、王世贞、朱谋壘、孙能传之论姜亦以“俗”为厌。有可能“姜体”在当时遍及天下而仿效者如过江之鲫导致审美疲劳。

但这不意味姜立纲从此全然退出历史。当姜立纲作为引领时代的精英文化代表之时，我们不要忘了姜立纲的身份是朝廷的高级书手。所以后来姜书作为国家标准字体保留在诸如《明伦大典》之类的官方文献之中，民间流传《中书楷诀》《东溪书法》《书法全卷》《七十二例法》《楷法大成》《字学绳尺》等署名姜立纲的书法启蒙教科书，可见姜书慢慢沉潜为小传统的一部分，于后世发生持续的影响。道学家吕坤（1536—1618）《吕新吾先生社学要略》论证姜书之有益于性灵：“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有司先将此书，令善书人写姜体字，刊布社学师弟，令之习学。盖姜字虽吃力，而点画分毫不苟，作字之时，能令此心不放、此心不粗。佻达纵横者厌之，以为欠苍劲、欠自然；而不知有益于性灵也。”不知道此语是不是解释、呼应了当初皇帝推崇馆阁体的初衷，即书法可以成为实施皇权政治统治的一个隐蔽手段。

文化土壤

考察地域书风尤其如龙湾（永嘉场）这么一个蕞尔之区，往往很难梳理一条可靠的令人信服的脉络。历史总是留给后人一些残片，残片之间常缺少清晰的联系。更何况，从文化的时空传播方式而言，书法的传承关系常是非线性的层递网络。尤其在资讯发达的晚近社会，考察一个书法家或者民间书手的书法传承关系，将是非常复杂的探寻之旅。

我们很难将明清之间的龙湾书法流变建立明晰的系谱，而只能在大范围上进行概括。清代初期的永嘉场经历了迁界，人口迁移导致原本有一点地域色彩的永嘉场文化面目变得更加模糊不清。如果可以举例，或者乾隆

年间普门张元观（1702-1769）、陈瑞辉（生卒不详）可以略作代表。但是二者都没有以书为业，前者居官，后者系诗人张泰青之母，无从谈起其书法的社会影响，实不足以纳入地方书法史来阐述。这种情况与明代从事馆阁体书写的龙湾籍官僚士人群体有所不同。明代姜立纲的海内外影响面广泛，温州地区更是影响甚大。因为温州善书者群体彼此互相照应，导致地方人士以效仿“姜体”为应制进身之道，可想而知在地方必然有一定数量的善书者构成馆阁体书写的“文化土壤”，例如张璫盛赞“姜卿楷书今第一”。茶山徐仲纲（嘉靖间人）以其书风模仿姜立纲而易名“仲纲”，可能他们最初都是本地“文化土壤”的一员。但是清代前期的龙湾书法没有这种土壤。

或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龙湾书法纳入温州（永嘉）这个文化场域来讨论会更加合适，因为清代永嘉场与代表永嘉文化主体的郡城的联系较之宋明愈加密切，无论人员往来或者信息传播，瑞安、瓯海、龙湾、鹿城、永嘉、乐清等地向来是水乳交融莫分彼此，语言相通，文化有很大的同质性。毕竟作为沿海城市，温州并不同于山地地带的“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但是清代前中期的温州书法也没有特别有影响力足以代表地方形象的人物。或许我们可以通过“本朝（嘉庆）永嘉第一”的画家项维仁的个案概述清代永嘉（包括龙湾）的一般的书法生态。

项维仁晚年居温州城区松台山麓，自号果园、勉轩、五美山人、松台客樵等。传说此人生性耿介不羁，早年得罪地方官而避居金陵多年。乾隆乙卯（1795），项维仁作画记游冒雪游仙岩，题一古风，有句云：“乘酣磅礴偶成图，雪泥鸿爪又何须。掷笔大呼吁嗟乎，如此豪游千古无。”但是我们没有过眼项氏“磅礴”类型的山水画，倒是有大量的四王风格的山水，题跋“仿赵大年”“仿赵湖州”“仿唐六如”“仿米南宫”，其实面目都是自己的。这也是清代四王一脉山水的概貌，陈陈相因，规整细密，略得仿佛而已。项维仁能诗，具佛道色彩和民俗性，我们也在其书法中看到项维仁所诠释的民间化的米南宫体：瘦硬、平正。除了出入笔仿佛米芾的尖利，但全然失去米芾所谓的“臣刷字”的感觉。推究其原因，可能项维仁的绘画、书法范本资源来自早年金陵、杭州的游历以及书画谱，所以终究不能逼似原作精神。这也提示我们一个以标榜精英为宗旨的书法编纂史所忽略的一面：民间书写对大传统的解构和重构，制造了一种异变的书写模式。古代书法传播渠道狭窄，民间难以看到精英书法原件，而更多的只能依靠摩崖、碑刻、

书画谱等经过过滤的二手书法资源，雾里看花的揣摩反而为临仿者提供了开阔的想象空间，根据自身理解对所谓“经典”做出新的阐释，制造出“似是而非”的新的书写。这种异变的民间书写模式构成中国书法史上庞大、丰厚的书法“文化土壤”。而这种“文化土壤”又反馈于精英书写，为之提供可供参考的书写资源，创生新的书法审美格局。以此观看魏晋残纸与二王、敦煌写经与颜真卿，可以窥见民间书写与精英书写并行不悖的互补关系。

这种“文化土壤”在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龙湾，张振夔（1798—1866）、王德馨（1819—1888）、项周栗（1821—1891）、王显耀（1864—1943）、项廷祯（1869—1938）、王增祥（1879—1958年）、王廷一（1881—1946）、杨乡衡（1888—1951）、王梅庵（1889—1951）、张肇麟（1892—1956）、张肇騫（1900—1972）、项攀龙（1906—1966）等人有所全面展示。张振夔曾为幕僚，项廷祯周旋政商，王廷一从事司法，杨乡衡从军，王显耀、项周栗、王德馨为塾师，王梅庵、张肇麟办新学，张肇騫系教授，张崇楷从医，王增祥系账房。除了以上诸位，其实还存在一些不从事书法艺术活动却间接影响地域书法文化土壤的文人。

在中国书法史上，这些人可能只是沧海一粟，但是在地方上却算是精英知识阶层，在信息闭塞的农耕时代，这些人构成引导地方书风的主要人群。

值得一提的是王梅庵。显然，梅庵的书法是典型的精英书写。与姜立纲充当朝廷书手不一样，王梅庵是本地书法史上第一位有明确自觉意识将书法作为人生理想追求的人，并且着意于从大传统的视野省思中国书法史，有一番欲求在书法史上有所作为的宏图壮志。

梅庵没有为后人留下完整的书法省思和自我艺术的陈述，但是夏承焘日记记录了零散的梅庵论书言谈。《天风阁学词日记》：“（1939）11月27日，午后梅翁来，论书法，谓石斋（黄道周）上溯钟繇。繇出于汉隶，故字形扁方。又论侧锋取势法，能无虚锋淹墨。”“（1946）8月1日晚，赴癯禅（夏承焘）处谈书法，谓张迁可配鲁公，礼器可配褚，劝夏从漳浦入钟傅。”“（1947）4月6日夕，梅庵招饮癯禅、公愚、介堪于岳坟快乐园，过西泠印社，晤韩登安、唐侠尘。梅庵与福庵论书法，谓欲融篆隶入行楷。5月8日，季思转述梅庵评点癯禅书法，谓但具姿态，于楷隶无工夫。梅庵赏心叔（任铭善）而薄公愚。”“（1948）11月7日，王梅老论书法，甚不满湛翁（马一浮）斜肩侧背。”

至今市面尚有流传署名姜立纲的书法著述如《中书楷诀》之类，但是大多是归纳书法技巧类型的通俗蒙学读物。有别于斯，王梅庵的讨论书法技巧是基于其审美视角的切入，其讨论的话题直接取资于大传统，有意“改造”颜柳、《张迁》《礼器》等等经典，意图“创新”一种表述自我书法审美的书写方式。夏承焘评梅庵“气盛言直，殆半关天分，半关体力”。从《学词日记》梅庵评点古今书人及碑帖可以窥见梅庵“气盛”所延伸的对书法审美的理解，以正大、高古、醇雅为宗旨。早在20世纪20年代，梅庵已与溥心畬、沈尹默、叶恭绰等书法家齐名于燕京，时人赞称“其书熔篆隶碑帖于一炉。真书、行、草兼工，临褚深得神髓，章草尤独绝一时。”抗日战争结束之后，胡兰成流寓温州，回忆曾在刘景晨处与梅庵有过一面之缘：“有个王荣年，当过浙江省政府秘书长，章草工夫甚深，却狂言不可一世，大概他的字像熊十力的佛学，不知何处总有着不对。刘先生当面说他：字总要有味，荣年的字无味。”此亦可见梅庵书法独到的乃至引起争议的一面。书法写到这份上，大概如高手过招，其中境界肯定不是流俗之辈所能轻易真切体味的。

潜在书写

如果要将书法上升成为一门雅文化，除了家庭物质条件和自身天赋，还需要社会信息渠道的开辟与书法学习范本的获得。王梅庵的成就很大一部分离不开其家学渊源及其仕途交游。梅庵出身仕宦人家，父王焕熙（1840—1912）知含山县、芜湖县，兄王鸿年（1870—1946）系近代外交家。梅庵毕业于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政治本科，又赴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获政学士学位。1920年至1926年在北平活动。1927年初赴杭投效于北伐军东路的第一军，1929年至1930年任北平昌平县官产局局长。1931年至1937年任青岛特别市市政府第三科科长。1937年返乡应温州专员蒋志英之邀任专署第一科科长。1940年起义务担任环川小学（天河乡中心学校）校长四年。1946年8月至1949年初兼任水利部浙江塘工委员会主任秘书。奔波的生涯赋予王梅庵丰富的阅历，结识了形形色色的文化人：江庸、郭沫若、赵元任、林宰平、韩登安、唐侠尘、王福庵、章太炎、马一浮、刘景晨、王景甫、吴洗凡、梅冷生、陈仲陶、夏癯禅、王季思、马公愚、郑曼青、孙孟

晋（孙延钊）、夏鼐、戴家祥、方介堪、吴鹭山……良师益友之间的相互扶持，对于有志于成为一名书法家的人是极其重要的助缘。而在农耕社会，仅士绅阶层少数的人士才有机会获得诸如游学、结交名士的机会，这不是社会底层的普通人所能经历和理解的。俗话说，站得高看得远。存在决定意识。井蛙不可与语海，夏虫不可与语冰。拘于见识的芸芸之辈，又从何谈起“适千里”的感受呢？这种体验，姜立纲、王梅庵做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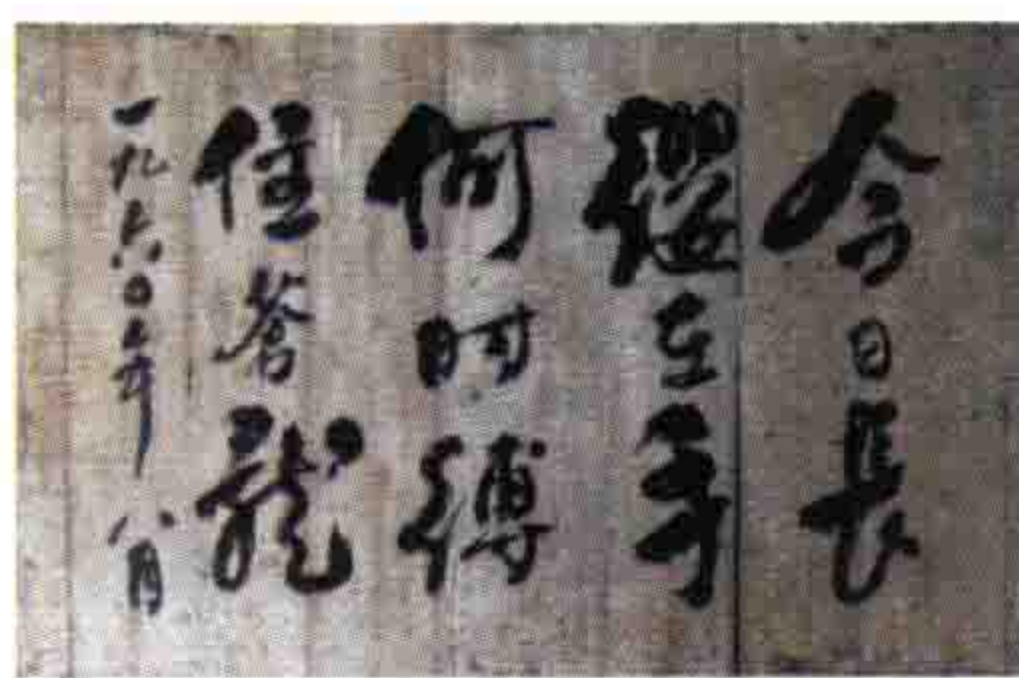
清末民初，甲骨、金文、简牍书不断出土，印刷术、照相术的进步，为时人提供了丰富的书法文献资源。梅庵早年临褚本《圣教序》十七通，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最后一通临本出售，一时洛阳纸贵。今见章太炎撰文、王梅庵书丹、李月庭镌石《天门沈公墓志铭》，逼似褚书而点画精到，纤毫毕现。由此推知王梅庵入门范本必然精良。王益强女士回忆，王家抄家之后，边厢的梅庵书房图籍散佚一空。梅冷生（籀园图书馆馆长）曾至温州住处帮助令先母料理书籍，设法变卖了一部分书籍为图书馆所有，以纾困境。以此推知梅庵藏书之佳良必不待言。

“文革”期间，中国人口流动受到很大限制，美术图书出版无论质量还是发行都大幅下滑。夫子云：礼失求诸野。大意王权隳落之后，民间遗留的礼乐文化，薪尽而火传。而事实上，人类从农耕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科技进步为极权政治的膨胀提供了无孔不入的途径，政治对社会的管控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果说，姜立纲的时代，地方上的“姜体”效仿者有机会通过姜书《明赠徵仕郎中书舍人柳公合葬墓志铭》《观音寺碑》《姜赤涯碑》乃至《李白梦游天姥山吟留别》参考领悟姜书风神，但是深入到民间的“文化大革命”有别于之前的任何一个时代，图籍焚毁自不必说，即使宗祠、厅堂、牌坊的牌匾、对联、田野的碑刻摩崖，只要发现则大多铲平、覆盖、捣毁、挪移。与梅庵同时代的地方缙绅尚有瞿溪潘国纲，沙城杨乡衡、项攀龙，高原张肇麟等辈，未必如梅庵的以书为志，却都能写一手不落俗的好字。但是在异代之际以非正常的形式退出历史，带来的是地域人文环境的恶化及传统文化断层。“文化大革命”把全国上下各个阶层的人群都卷了进去，所有的文化资源能量，或扬弃、或改造、或新创，被重新洗牌。

尽管民间学书者的人脉渠道、临书范本都受到了限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旧时代旧文化的遗响彻底衰竭，譬如烟灰碓里总有一二火星遗留。例如一直接受梅庵沾溉的据说有金启珍（小学教员，赴台）、王荫槐（族侄，中



楊乡衡书门额



王开祯漆书《毛主席诗词》

医师)、王鸿章(族弟,号勉三)等数人。王荫槐系温州市第一批全国书协会员,毕生唯独临摹梅庵,书风与其绝似而雷池不敢稍逾。王鸿章(号勉三)系梅庵堂弟,与其相差了23岁,早年任私塾教员、小学教师11年,1946年随梅庵赴杭谋职,曾任水利部浙江塘工委员会办事员、浙五区(温州)专员公署视察员。200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王勉三有幸得到梅庵亲炙,曾复印放大梅庵临褚书《圣教序》一本,终生参考临摹。与此同时,龙湾尚有张崇楷(1909—1984)、姚鹤湘(1910—1999)、王毅(1915—1995)、张开楨(1921—2008)、项宪章(1923—2006)、项培尧(1924—2010)、陈贯时(1928—1994)、李欣荣(1936年出生)等人。姚鹤湘、王毅、张开楨、项培尧系髹漆老司。髹漆老司一般兼擅书画,未必经过专门书法训练,像姚鹤湘、王毅是典型的“画家字”。有意思的是,王毅的画跋无门无派,信手游缰,绝似黄慎、七道士的怪里怪气,具强烈的民间书写的趣味。

但是绝大多数的民间书写者都有隐约的从大传统汲取养分的渊源。项培尧早年贫寒,请小学同学的父亲用泥烧方砖当纸,用“笋籽壳”捣细制笔蘸水练字,曾师从前清举人文成人刘景元,学过颜体、米南宫临《十七帖》、赵孟頫、张猛龙。李欣荣与梅庵同乡里,初学于同村人张开楨,在小学代课时,发现有不少“文革”抄家时期寄存于学校的字帖书籍,遂从中拣得米南宫草书《十七帖》、于右任《标准草书》作为学书的范本。永昌堡都堂第的板壁、门柱上有毛主席语录诗词墨迹,据说是张开楨手笔,用无法辨析具体书风来源的隶书以及何绍基的书风写就。这不禁令人联想到陈思和关于当代文学史所创立的概念“潜在写作”。即一些被剥夺自由写作权利之后的作家借用“民间隐形结构”的艺术手法,使作品在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同时,曲折传达出真实的社会信息。那么,这里借用概念于前三十年的书法现象,项培尧、李欣荣等人的书写或许算“潜在书写”吧。当时一些官方全权控制的文物、书画、美术出版社,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文艺口号之下,出版了诸如米芾、苏轼等复印碑帖,供文艺工作者以“批判”的视角参考借鉴。当代一些老一辈书法家自谓当年曾经受益于每天写大字报而训练了自己的书法基本功,或许正是类似“潜在写作”的一种书写模式,通过抄语录口号、画壁、髹漆等方式,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同时,获得接触传统文化资源的机会,曲折地表达自己对传统的理解和敬意。